



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 意涵、问题与策略

李盛聪

摘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社区不仅仅是供人居住的物理空间，还是人们生活交往的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是人的身体、生命和情感栖息与寄托之地。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在地性、便捷性、邻里性是积极老龄化的最佳场域。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是指社区时空中各类养教主体充分利用养教资源、协同合作，促进老人身心全面发展，不断提高老人生命质量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这一过程构成了以主体协同为核心、制度协同为基础、资源协同和评价协同一体化的，促进老人健康、参与、保障等各种资本获得的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框架，具有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人的整体发展和满足老人现实需求的价值意蕴。当前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存在主体分割、内容分离、专业人员短缺等问题，需要从法制与自治融合的顶层上、利益与责任融合的机制上、身体与生命融合的内容上、多样化与数字化融合的方法上构建解决策略。

关键词：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生命发展；身心一体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4.0505

收稿日期：2023-12-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师范大学校级专项重点课题“新时代民族互嵌社区老年教育协同模式研究”(22XW06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盛聪，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区教育、老年教育，E-mail: lishengcong64@163.com。

一 研究缘由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老龄化既是人类文明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与挑战。“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要远远快于很多中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①。截至 2022 年末，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8004 万人^②；“预计‘十四五’时期，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 3 亿，占比将超过 20%。2035 年，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 4.2 亿左右，占比将超过 30%”^③。如何迎接和破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已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共同演化将带来社会发展的滞缓、家庭负担的加重和老人养教需求的激增。由此，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逐渐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明确提出，要“探索养教结合新模式。整合利用社区居家养老资源……推进养教一体化，推动老年教育融入养

①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世界卫生组织 2016 年版，第 1 页。

②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2022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2023 年 12 月 14 日发布，2023 年 12 月 15 日访问，<https://www.mca.gov.cn/n152/n165/c1662004999979996614/attr/315138.pdf>。

③ 马晓伟《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推进老龄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2022 年 8 月 30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中国人大网，2022 年 8 月 31 日发布，2023 年 6 月 17 日访问，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208/t20220831_319086.html。

老服务体系,丰富住养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①。2021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强调,“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发挥社区党组织作用,引导老年人进行积极老龄观”^②。2022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重申“鼓励养教结合创新实践,支持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学习点。发挥社区教育办学网络的作用,办好家门口的老年教育”^③。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④。社区是人们的生活空间、交往空间和精神空间,是人的身体、生命和情感栖息与寄托之地;从政治学角度讲,基层社区是国家大厦中层(省市)和高层(中央)的坚实基础及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关键之地;从社会学角度讲,社区是化解矛盾、破解民生难题、实现社会稳定的根基。社区教育通过培养公民知、情、意、行的全面教育而凝聚人心、形成社会内生动力,夯实国家发展的根基。社区教育、社区养老是国家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是形塑“积极公民身份”和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方式;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和认同国家的基本途径;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实质是探索人的生理、身体与精神的整体生命发展,以实现共同体及老人的“善”(利益、幸福)。社区居家养老是植根于中国社会与传统养老文化上的最根本的养老方式。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在地性(区域性)、便捷性(可及性)、邻里性(情感性)是从源头上、系统上破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老人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的最佳场域。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是中国式社区老年教育的创新,它不仅拓展了社区老年教育新的场景、新的内容、新的方式,重塑了社区老年教育的新思维、新机制和新模式,而且实现了社区老年教育从资源分配正义到尊重、爱、创造等承认正义的全面跃升。如何实现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解决老人“一座”与“一床”难求及分离的现实境遇,全国许多城市在实践中已有尝试,学术界亦展开了研究。但在现实中这种“结合”常常遭遇不畅,难以落实;在理论研究上宏观描述多于学理思考,洞识不深,难以指导实践。因此,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二 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意涵与框架

在20世纪以前,养老还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自发的家庭私人事务,教育与养老也是互不交集的领域。关于养教等老年性问题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在欧洲诞生的“老年学”(Gerontology)。1903年,在法工作的俄籍生物学家麦奇尼柯夫(Eile Metchnikoff)创立了“老年学”这个词。1909年奥地利医师那斯契(Ignatz Leo Nascher)创立了老年医学(Geriatrics)^⑤。此后世界各国研究老年问题的组织、论著逐渐增多。1945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致力于老龄化领域研究、教育和实践的跨学科科学组织——老年学会(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开始对老年生物学、老年医学、老年行为、老年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并发行了两本老年学期刊。此后,美国南加州大学成立了伦纳德·戴维斯老年学学院(The Leonard Davis School of Gerontology),提供老年学位教育,老年研究逐渐从欧洲转向美国。长期以来,老年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生物学、医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及其产生的实证主义研究为主,老年心理学也是如此,将个体看作是心理事实与行为模式组成的复合整体,缺乏对人的生活整体和生命体验的人文诠释。在英、法、德等国20世纪40年代相继出台的福利政策,如英国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也只是把老人作为弱势群体来救济,并未关注老人教育的问题。老年教育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在欧美国家兴起,老年养教的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一)关于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研究

近几年来,国内关于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研究逐渐增多,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以教养老”说。这种观点把社区老年教育作为养老的手段或路径,强调教育在养老中的作用与价值,主张以社区老年教育为中心,在各类老年教育机构中融入养老知识与活动。养教结合“即在进行养老服务的过程中融入老

①《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6年第31号,第30页。

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年第34号,第10、12—13页。

③《“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年第7号,第22页。

④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9页。

⑤黄富顺、杨国德《高龄学》,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3页。

年教育,在老年教育的范畴内强调养老服务”^①;养教结合“泛指各种养老形式和各类老年教育形式相融合,在养老机构进行老年教育,把养老服务寓于老年教育活动中”^②。二是“以养融教”说。此种观点认为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应以养老中心为主,各类老年教育送教上门。所谓“养教结合”即“在政府老年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下,各级各类老年大学、社区老年学校等老年教育办学机构”按需分配老年教育的师资与课程给合作单位的养老机构,“老年教育机构主要承担教学工作、养老机构主要……提供教学场所和组织老年学习者”^③。三是“结合”说。认为养教结合“就是将老年教育融合到养老生活的各个场景当中”^④。养教结合“泛指各种养老模式和各类老年教育模式的融合”^⑤。

国外社区老年教育与养老研究起源较早,但关于养教结合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老化与心理与养教实践的研究上。首先,老化与心理的研究主要从生理老化、心理老化和社会老化三个维度进行了研究,其重点是从神经科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老人的学习特点。如 Park 和 Reuter-Lorenz 在 2009 年提出了“衰老和认知的脚手架理论”(Scaffolding Theory of Aging and Cognition),认为通过学习,人类的大脑可以持续建构或更新神经认知脚手架,以适应变动的外在环境^⑥。心理学家巴尔特斯等借鉴卡特(Cattell)和霍恩(Horn)对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的论述,提出了一套成人发展的理论^⑦。该研究充分证明了老年人学习的可能性与价值。社会老化理论主要有艾玲·库明(Elaine Cumming)和威廉·亨利(William Earl Henry)的撤退理论、罗伯特·哈维赫斯特(Robert Havighurst)的活动理论和贝得斯比(Battersby)的批判老年教育学^⑧等,这些理论从老人的社会参与、角色转变和教育(学习)促进老人价值与发展上进行了探索。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都开始在城乡社区建立了养教结合中心,但仍普遍缺乏对诸如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机制、价值、问题、结合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二)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含义

1.“养”、“教”的词源学理解

“养”的本义是放牧羊群,发展至今含有养育、修养、养老之意。在英语中,养含有抚养、养育、培养等含义^⑨。在中国文化中,“养”包含物质与精神,即道家养生提倡的“形神兼养”、儒家典籍中强调的“存心养性”等,其义皆是身心修养。“教”的本义就是教育、指导;“育”是抚养和教育之意。所以,教育包含了抚养。康德说:“我们把教育理解为照管(供养、抚养)、训诫(管教)和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⑩

2.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含义

从上述分析来看,养教本质上是一体的。“养老、修养”是集养身、养心、养神为一体的实践活动,它包含着教育与学习过程;“教育”也内含着对人类身体抚养、健全与全面发展的价值与责任。中国文化的修养、养生注重形神统一、心身统一,并通过身心统一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与问题,从而达到人与自然、自我、社会和天的和谐统一。从目的上看,养教结合是个体由内而外的扩展,是身心一体、身心双修,是体悟大道、知行合一、追求生命意义、探索生命价值的过程。海德格尔指出,“死亡所指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此在的存在走到尽头,而是这一存在者的向死而在”^⑪,认为人是向死的存在,有死才会有“生”的意义。从性质上看,与农耕

① 杜远征《养教结合视角下老年人教育问题研究》,《智库时代》2019年第25期,第94页。

② 许丽英、汪娟、吴卫伟《养教结合的城市社区老年教育模式研究》,《当代继续教育》2018年第3期,第27页。

③ 张东平主编《老年教育社会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1页。

④ 蒋文宁《“养教用”结合的老年教育新模式探索》,《成人教育》2018年第3期,第42页。

⑤ 张少芳《老年人养教结合模式发展瓶颈及对策》,《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年13期,第3363页。

⑥ Denise C. Park, Patricia Reuter-Lorenz, “The Adaptive Brain: Aging and Neurocognitive Scaffold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0 (January 2009): 173-196.

⑦ Paul B. Baltes, Freya Dittmann-Kohli, Roger A. Dixo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in Adulthood: Toward a Dual-process Conception and a Model of 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in *Life-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vol. 6, ed. Paul B. Baltes, Orville G. Brim, J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4), 33-76.

⑧ 黄富顺主编《高龄教育学》,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122-124页。

⑨ A.S.霍恩比编《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10版)》,于海江等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6版,第1801页。

⑩ 伊曼努尔·康德《教育学》,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1页。

⑪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说存在与思》,颜东升编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页。

文明时期老人自发的养老及对物质追求的不同,今天的老人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的社会养老,养教已经成为人类现代化进程和人口老龄化加深的社会制度变革,是政府、社会 and 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是将“人民性”、“服务性”转化为实践的桥梁,是主动赢取民众国家认同的关键路径。从人的身心发展上看,无论哪个发展阶段的人(儿童或老人)永远都是“未完成”性的,人一生中总是要不断地面对各种问题,并通过学习解决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从养教空间上看,包括家庭、社区和社会(专业机构)三种养教场所,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的影响,居家社区养老是中国老人绝对的主场。所以,包含家庭并处于家庭与社会(国家)枢纽的社区老年教育养教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最经济、最方便、最能满足老人发展需要、最能体现中国文化和社会特点的教育活动和范式。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是人身心一体化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本质显现,是合规律、合价值的辩证统一体。

“结合”是不同社会组织或人之间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嵌入、相互支持形成的有机联合活动和行为,结合的本质是协同、合作。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是指社区时空中各类养教主体充分利用人、技术等养教资源协同合作,弥补老年教育与养老的“短板”和“盲区”,解决教育与养老系统无法独立完成的事务,促进老人身心全面发展,不断提高老人生活生命质量,构建公平、全面的老年养教服务体系。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指区(县)范围内有学习能力的老人,不包括失智失能者。

3.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框架

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不是社区“老年教育”与“养老机构”简单的叠加或内容互换,而是社区场域中政府、市场、社会不同主体在共同目标下形成社区老年教育养教在理念、制度、资源、运行等方面形成的有机协同与融合。本文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根据“场域—资本—惯习”、积极老龄化“健康—参与—保障”理论和养教实践,以社区内所有养教主体或机构(政府、市场、社会、老人)协同为核心,制度协同为抓手,老人生命质量提升与和谐社会构建为目的,尝试构建了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应然框架(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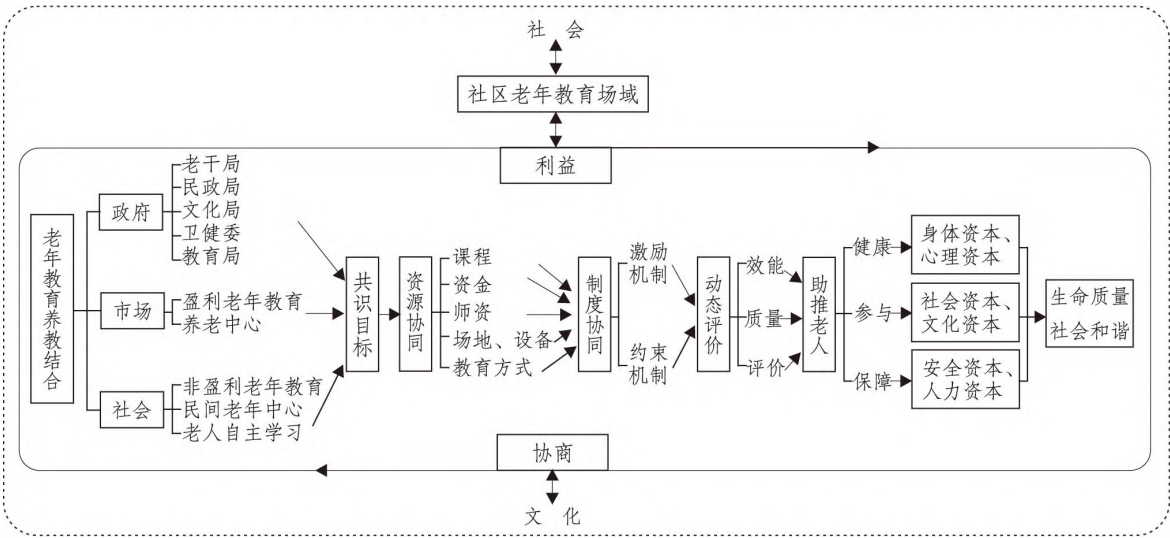


图 1 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框架

从协同治理理论看,协同是指人们面对问题时,不同部门、主体以共识为基础、以目标为导向形成的集体决策和合作行为。

社区养教结合(框架)具有五个特征。一是养教主体的多元性。这些主体既包括管理性主体(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社区内结构性主体(如教育局、民政局等各部门)间的协同,层次性主体(区、街道、社区、家庭等)的协同,也包括不同年龄群体(青少年、成人、老人)的协同,是一个复杂的多主体跨域治理网络系统。二是养教结合的共识性。共识是主体间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形成的对行动目标的共同认识。各主体应打破对老人的刻板化与歧视,正视老人的价值和贡献,形成共同的认识、理念和目标,共建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三是养教制度的协同性。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关键是建立协同的制度,统一领导、明确各主体的责任、权利,避免主体间的冲突、矛盾和无序竞争。协同制度包括正式的规章制度和非正式交往习俗等。四是

养教行动的策略性。从系统论看,养教结合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是从无序到有序、从量变到质变的自组织增效的行动,是社区治理和社区教育的动力,也是社区居民自主教育与自主养老的组织创新。大量的养教结合自主组织,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打破单一依赖政府的传统路径。五是养教结果的成效性。作为准公共服务,社区养教结合必须实现较高的投入产出比,亦即普惠公平、有效的公共利益目标达成度。与传统的社区老年教育相比,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创新在于:第一,拓展了老年教育的新场景,使教育延伸至老人、家庭和社区等各种生活和养老场景之中;第二,创新了社区多元主体共育共治的机制和育人的生态模式;第三,凝聚了“养”、“教”的共性与活力,重塑了社区老年教育的内容、方法,从而实现对老人整体生命的关怀。

三 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价值意蕴

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具有继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人的生命整体性发展和满足老人现实需求、助推健康老龄化的价值。其根本逻辑是充分利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禀赋,构建中国式养教结合的模式和理论体系。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文化是人类群体的意识与行为,它反映了这个群体的传统并通过社会学习而代代相传,文化得以塑造并塑造人。养老、敬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是以伦理为中心的,“伦”即“关系”或“类别”,分别是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父子不仅是前三者家庭关系的核心,也是后两种关系延伸的核心。以父子为核心的人伦是建立在中国家庭血缘基础上的,“孝”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德。“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①。儒家文化由“孝”推及对国家、社会、他人的“忠”、“礼”、“仁”。养老起源于夏商之前,西周成制,秦汉已经达到高峰。汉代耕读者15岁前必须读《孝经》,官员察举也以孝为先,还对70岁老人颁发鸠杖以示尊敬和赡养。当然,对老人的赡养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的关键功能是为“社会持续”而抚育、培养社会合格的人,实现社会永续绵延。费孝通指出,西方家庭以这种“接力模式”为基本形式,但是中国的家庭在亲代对子代的“接力”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功能,即子代对亲代的赡养,这是中国特有的“反馈模式”^②。我国历史悠久的养教文化是滋养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发展的源泉,今天的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是中国传统养老文化的继承、彰显和创新,它已从过去狭隘的个人、家庭视域走向了全社会对老人的关心和支持。

(二)追求人的整体性发展

人是生物、社会和精神存在的统一体,这种统一构成了人生命的整体性。有学者认为:“素养的发展贯穿个体生命始终,整合了包括物理、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等多个水平的诸多要素及其关系,是一个持续的、有机的生成(becoming)和建构(constructed)的过程。”^③笔者认为应该在人的生理物理性、社会文化性和心理行为性的基础上加上精神性来阐释人的生命整体性,唯有精神是人与其他生物区别的唯一性。老人的成长与发展也是整体的,养教结合的本质是对人的四个内在特性的整体性培养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了养教的有机一体化思想。《淮南子·原道训》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④“精”是人的身体或构成身体的细微物质,“神”即人的心灵(精神),“气”是身体与心灵之间的连接。“养生”的终极目标是在养“精”、“气”基础上的养“神”。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身心问题一直是哲学家们思考的中心。然而西方哲学曾经是身心分离的。理性主义的身心分离论,排斥身体、排斥人的生命整体性而遭到许多哲学家的批判和纠正,诚如贺麟所指出的:“身体和环境是统一性的,至于身体和灵魂心智,更是打成一片,不可分割的。”^⑤身体是人理解世界的方式^⑥,身心是灵与肉的统一体。神经科学研究发现,“社会

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第7页。

③杨向东《作为理论构念的素养及其模型构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11期,第44页。

④何宁《淮南子集释》,《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2页。

⑤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⑥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5页。

性参与和认知活动甚至可以帮助老年人保持脑和心智的健康”^①，“学习是一种对抗脑功能退化的有效方法”^②。在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教育）是最好的养老。从公共立场的教育看，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不仅能增进老人个体幸福（生命质量提升），也会增加社会的福祉和人类的共同利益（和谐社会构建）。所以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既实现了对老人生命的整体关照，又实现了社会公共利益和福祉的创造，它是合人性的、合公共性的整体教育。

（三）满足了老人及社会的现实需求

我国快速的老龄化和少子化，从时间轴线看必然带来养教的普遍与结构性矛盾，从空间上看必然带来社会、社区、家庭和老人的全域融合。作为终身教育组成部分的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方式不仅能为老人增权赋能、满足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内在需求，而且是实施积极老龄化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必由之路，也是从源头和系统上破解当前社区老年教育养教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分散低效等碎片化现状的需要。在一个不断流动的社会里，要想对每一个人零距离对接与服务，唯一的空间是社区。从上述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框架看，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可以促进老人在健康、参与和保障中各种资本和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从健康视角看，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不仅能通过学习及身体的养护提高身体生理机能，形成健康的身体资本，而且通过社区学习、交流，增进彼此的信任、情感，形成良好的心理资本。从参与视角看，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可以扩大和增进老人的社会资本，通过学习建立新的社交圈和熟人圈，增加人际信任感、价值感和社区归属感，促进和提高老人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各种活动的意愿和能力；同时通过学习，也可以促进老人文化资本获得，如语言、身体、仪态、行为的形塑，知识、技能甚至文凭的获得，人格、心灵的解放等。从保障视角看，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可以培养老人特别是相对年轻老人生活生产的人力资本及应对更迭交替社会的自我生存与自我保护的能力。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保障了老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了老人的安全性、权利性意识和能力的增长。通过老人健康、参与和保障的促进，最终实现老人生命质量提升和谐社会的建构。所以，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是满足老人和社会需要最经济、最便捷、最人性的方式，是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途径。

四 我国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养教需求已经全面增长，作为共同富裕使命下党的一项重大国计民生工程，我国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创新实验。如上海静安区在养老机构中开设“乐龄课堂”，闵行区依托老年大学、老年学校、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建立养教结合的邻里中心；北京朝阳区以社区课堂为抓手，搭建“学习圈、服务圈、生活圈”三圈联动的养教文化平台；成都市书院街挖掘区域特色资源，形成了辖区内老年学校、医院、歌舞团、媒体等多主体参与的，集养老、休闲、教育、助餐等养教一体化服务综合体。全国各地社区养教实验方兴未艾，但是我国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仍然存在养教分离、有效供给不足、政策不完善、人才短缺等问题。

（一）理论欠缺，难以指导实践

理论是行动的根据，理论是观念世界、意义世界、方法世界。尽管有部分学者和产业界都积极投身到理论研讨与实践探索中，但由于养教自身的复杂性、关联性、跨越性和多业态混合性，明确其概念、内在逻辑，如为什么要实施养教结合，养教结合的内容、方式是什么，如何结合等问题，都未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在缺乏理论的情况下，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实践道路并不容易。教育工作者只研究教育中的问题，养老工作者只关心医养问题。加之当前老年教育和社区教育等理论的薄弱，导致实践中许多养教结合项目难以为继、老百姓满意或实现盈利的并不多。从认识上，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对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甚至存在误解和偏差，归根结底是由于当前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理论基础缺乏，理论深度与系统不足，发展理念不成熟，难以指导实践，亟待探索系统与科学的养教结合理论。

（二）主体分割，难以形成共识

^① 科拉·巴格利·马雷特等编著《人是如何学习的Ⅱ：学习者、境脉与文化》，裴新宁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页。

^②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理解脑——新的学习科学的诞生》，周加仙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问题是一个不同部门、不同主体利益相互交叉缠绕的复杂社会问题。从我国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管理主体来看,有民政、教育、卫健委、文化、老龄委、组织部等多部门分割管理;从实施主体看,有老年大学(老年学校)、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社区教育学院、社区学习中心;从主体性质看,有政府、市场、社会及个人。由于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管理主体、实施主体及主体性质的巨大差异,导致不同主体、部门之间存在政策壁垒,各自为政,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主体协同意愿不强,共识形成难。原因是基层政府与部门没有必须结合的要求,且结合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政治、社会风险,利益失衡和时间、精力的社会成本。二是主体协同缺乏客观条件。基层社区在预算与编制约束下,严重缺乏资金与人员等合作资源;在错综复杂的社区工作中,养教结合并非重点,且成效不易显现。三是社区老年教育属于公共教育,而社区养老则是商业服务,两者在工作理念、行为、目标上具有较大的张力与冲突。由于各主体之间功能交叉重叠,责权划分不清,加之各部门自身的目标、利益、管理方式等不同,造成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管理成为“九龙治水”的多头化、碎片化和资源浪费等怪象,致使社区老年教育养教难以真正地结合。

(三)政策碎片,难以推动结合

近几年,我国在老年教育和养老方面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十四五”期间出台了老年教育和养老的重要文件,上海、天津等6个省市专门颁发了老年教育促进条例,把养教结合作为老年教育的一种内容和方式。但是,在国家顶层设计上仍然缺乏养教结合的政策法规,各省市出台的地方老年教育条例,缺乏力透纸背的灼见和破解问题的措施。目前国家养教政策法规零散、缺乏,相关政策法规主要是倡议性、鼓励性表述,其模糊性、柔软性与宽自由裁量性导致现实的尴尬与无力;部门间、地方间、教育与养老机构间的政策不能有效贯通,存在许多堵点;各社区老年教育养教只能各自为政、各显神通,养教结合步履维艰。这需从顶层上明确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四)内容分离,难以满足需要

养教结合的难点还在于人们习惯从二元论的思维出发,把人的身体与心理、精神分离开来看待。换言之,我们日常生活中只重视老人身体、生理的养护,而不关注老人的知识、智慧、情感、态度等心理与精神的学习与培养,并总是认为前者比后者重要,身体养护是刚需,精神学习是务虚。基于生物的自然主义,把老人主要看成是一种自然的、客观的对象,如医学、护理主要关注的是处理老人与病菌、伤痛、衰老的自然问题,身体成为消费存在的生物性身体。以年轻人为中心的后喻文化社会并不重视老人的价值,或者把他们看成消极的群体。“历史学家早就开始撰写肉体的历史……他们把肉体看作是需求和欲望之源,心理变化和新陈代谢之所,细菌和病毒侵害目标……纯粹的生物学意义的生存基础”^①。养教的二分还表现在长期以来我国习惯于视老年教育事业为单纯的慈善服务而忽视老年人的内在需求和潜力发展。在教育管理上强调“我要教”,而不是“你需要”;在教育内容上体现为养老机构只重视医养、照护服务,基本没有教育,社区教育只重视休闲而忽视医养。养教在内容上的分离其实反映的是教育与养老、医疗在专业知识上缺乏结合和融合创新的能力。

当前养教内容分离现象十分突出。我国的社区已建立区(县)、街、居(村)院落的四级学习中心和养老服务中心,但是二者的优质资源并没有得到广泛而又高效地利用。绝大多数仍然表现为教中无养、养中无教的双轨并行制度,没有形成深度的养教结合机制体制。

(五)专业人员短缺,难以支撑结合

专业人员是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关键。受传统文化和经济的影响,我国老人更愿意选择居家社区养老。居家社区养老的现实,带来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社区老年教育养教专业人员主要是指教育、养老机构的教师和管理者。目前我国社区老年教育的教师与管理人员分为专职人员、兼职人员和志愿者;社区养老机构主要是医生、护士和护工。无论是社区教育机构,还是养老机构的人员从数量上都严重短缺,从质量上看专业知识、专业能力都较低,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不高,更缺乏养教结合的跨学科知识与能力。养教结合的教师既要有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又要有养老护理方面的知识能力。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专业人员的短缺和专业素养的低下是导致养教难以有效结合的重要原因。解决之

^①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版,第27页。

道,在于从顶层上、机制上、内容上和方式上进行策略构建。

五 策略构建

(一)顶层上,国家法制与居民自治的上下融合

教育是一项共同利益^①。因此,要从国家积极老龄化战略的高度,整体上设计养教结合的制度。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是多主体、多部门参与的国家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内在属性和责任。法治是养教结合从源头上破解当前社区养教结合多部门相互交叉重叠困境的根本方式。目前我国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缺乏相关政策法规。首先,政府要尽快明确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法律地位,建立多元化、普惠化以及责任细化的养教政策法规体系,为养教结合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和根本遵循。其次,地方政府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出台具体可操作性的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政策法规,厘清不同部门、主体责任权利的边界,纳入地方绩效考核。通过资金支持、政策优惠和政绩考核等手段激励养教结合的推进。再次,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在利益和需求多元的时代,仅靠政府难以满足老人对美好生活多样化的追求。政治民主和社会治理的共同指向是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公民的长期合力,其中公民自主参与是关键。要鼓励社会组织、志愿者、老人自己建立符合地方特色和老人需求的各种养教结合自组织或互助组织;充分发挥老人的主体性,使其成为自身健康的联合生产者和其他人健康的支持者。“主体性并非我们所具有的一种状态,而是我们所展开的一种行动……我们通过各种‘自我的实践’将自身建构为主体”^②。养教结合在过程上要赋予乐趣与愉悦感,在方法上给予老人多样的选择度、参与度与自由度,在场所氛围上要营造贴心的体验与精神关怀。同时,从社会舆论、国家政策、媒体宣传、生活场景、数字空间等方面,营造、鼓励全社会参与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形成全社会共同育人与包容的老龄文化和社会制度。

(二)机制上,利益与责任的共同融合

小智制事、大智治制。我国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粗放管理、各自为政等特征明显,迫切需要建设养教结合的体制机制,整合养教结合资源和各方力量,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应加快机构改革,加强归口管理,加大规划布局、统筹协调、制度创新,形成全国上下、各地各部门、各企业各单位、社会各方力量协同推进养教发展的整体合力。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是我国社区治理的一种全新的决策与参与机制。从政治上讲,这是一种参与式民主;从经济上讲,它实现了养教结合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社会上讲,它形成了养教服务的最优化及可持续的生态育人环境。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机制的关键是要处理好纵向上不同层级政府,横向上不同主体间的跨域合作问题。首先,建立各个主体之间的信任机制以形成共识。合作协同是人类生存发展与解决复杂问题的根本手段,“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人们之间需要共谋……而求同存异的过程也就是达成共识的过程”^③。其次,建立利益机制保证参与者的利益获得与享有。“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原始动力。主体间是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在利益诉求的前提下进行博弈,最终达到各自利益制衡下的平衡”^④。公共利益存在于各种私人利益相互实现的共同领域之中。社区老年养教结合中的“养”大多是营利为主的企业或私人机构,“教”更多的是基层政府或公益组织,而作为参与主体的老人的利益是性价比和优质服务,他们不仅存在竞争与合作,也会呈现不同利益诉求。因此,保证养教结合主体各方的利益,特别是以企业、民间为主的养老机构的利益,激励各方主体积极参与养教结合是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关键。再次,建立沟通机制。通过民主协商,明确各方责任、义务和权利的,解决冲突和矛盾;建立市一区(县)一街道办(乡镇)一社区(村委会)一院落一老年自主学习小组的养教结合治理链,形成政府支持、社区主办、社会互助的领导与评价机制。实现社区养教公共资源的集约共享、公共利益最大化,弥补和消解公益教育与企业养老二者在服务目标、方式和利益上的差异和张力。

(三)内容上,身体与生命的多维度融合

生命的多彩性决定了养教结合内容的丰富性和多维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享乐是人最平庸的本能生活,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版,第79—82页。

②狄安娜·泰勒编《福柯:关键概念》,庞弘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1页。

③郭湛等《公共性哲学——人的共同体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5页。

④李盛聪、韩忆娟、杨凤秋等《社区教育多元主体参与:成效、问题及对策》,《终身教育研究》2020年第5期,第54页。

善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最高目标。“善的事物已被分为三类,一些被称为外在的善,另外的被称为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①。他说的外在诸善是指财富、权力、名声等,身体诸善是健康、强壮等,灵魂诸善是公正、理智、节制等,人需要过政治的、思辨的生活。概括而言,人是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生命统一体,自然存在要求人必须关注自身生理身体的健康;社会存在即公共性存在,要求人必须适应和创新社会关系;精神存在是人的知识、思想及其超越,要求人必须探寻生命的意义。这三种“善”都必须通过以教育为主的人类活动来完成,并由此而提升人的幸福能力和意识。

首先,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除了提供身体康健、医疗卫生、休闲娱乐、就业技能、社会适应、社会参与等课程外,更重要的是要开设生命教育等课程,引领老年人对生命不断地反思与超越。这就是精神或西方学者说的灵性(spirituality)。“灵的思想指向的是人类有能力培养对精神的、超越的或终极现实的觉知和意识,并与其生活相联”^②。老年人的精神教育旨在探索生命意义与价值,获取内在统一、自我超越,以维持与他人、环境、世界、宇宙的统一,达到“天人合一”境界,以“豁达”(看穿事物表象,开阔胸襟、宽容仁爱)和“悠然”(面对老化带来的丧失、痛苦与消极影响的坦然)化解生命的苦难与际遇。其次,增加社区老年养教资源平衡,解决资源供给不足与资源效能不高等问题。从养教资源分配上看,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高收入、高教育水平与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健康的与不健康的老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从养教资源供给水平上看,还不能有效满足老年人的生活和学习需求。从资源供给结构和共享上看,还没有形成差异化、精准化供给,同时供给缺乏合力。所以,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不仅应有养生、健身及生活、休闲的知识、技能,更要提高老人情感、自由、参与、反思的生命追求,而且要丰富资源供给,满足不同老人养教的不同需求,推进社区老年养教资源的公平和共享。

(四)方法上,推进多样化、专业化、数字化融合

意义在生活中赋形与表现。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本质是生活教育,周遭的生活既是丰富的学习来源,也是开启老人感知、智慧的钥匙。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生活教育,本质是居民在真实生活情境中,具身地、体验地学习知识、理解知识并应用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生活教育的最终落脚点是体验(经验)和实践”^③。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既追求由知到行、由学到用的知识价值的学习,也践行由行到知、由用到学的体验和实践。“体验绝不会停留于认知中,人们总是以此连接自己生命的过去、现在、未来……从而悟出生命的完整意义……丰富内心世界,铸就信仰”^④。目前我国社区老年养教结合在方式方法上主要是以课堂教学、参观访问为主,形式比较单一。因此,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应该围绕老人生活、生命发展而开展多样化的方式。首先,在老人生命教育方式上,黄富顺在综合分析了国外学者的观点上认为有六种途径:一是指老年个体以叙说或书写的方式回忆、反思与体悟生命意义;二是在绘画或欣赏艺术作品中,探索内心感受;三是借由对身体的掌控,用肢体语言呈现言语无法表达的律动与舞蹈;四是戏剧的即兴创作;五是聆听欣赏舒缓柔和的音乐,进入内心的自我世界;六是冥想,放松身心、超越自我^⑤。上述方式隐喻着生命教育方法的集成性和多样性。其次,推进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专业化,包括理论的专业化和人才的专业化。最后,开启“数字养教”的新路径。总之,鼓励全社会所有有能力的人投身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工作,助力老龄化社会发展,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责任编辑:罗银科]

①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1页。

②Thom Moore, Bret Kloos, Rachel Rasmussen, "A Reunion of Ideas: Complementary Inquiry and Collaborative Interventions of Spirituality, Religion, and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9, no. 5 (September 2001): 491.

③李盛聪、陈思诗、李宜芯等《城市社区学习中心能力建设与路径探索》,《现代远距离教育》2022年3期,第94页。

④李盛聪、韩忆娟、李宜芯《社区教育游学课程的价值与重构》,《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第83页。

⑤黄富顺《高龄心理学》,师大书苑有限公司2012版,第427—429页。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Elderly Education and Care: Implications, Issues, and Strategies

Li Shengcong 136-144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a global issue we all face. Community is not only a physical space for people to live in, but also a cultural and spiritual space for people to liv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where people's body, life and emotions reside and rest. The local, convenient and neighborly natur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care for the elderly is the best field for active aging. The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elderly education and care refers to various elderly care and education entities in the community utilizing resources collaboratively,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s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 continuously enhanc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process constitutes a framework of community integration for elderly education and care that emphasizes subject coordination as the core,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as the foundation, integrated coordination of resources and assessment, aiming to enhance the elderly's access to various forms of capital such as health, participation, and security, while embodying the values of showcas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ursuing holistic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eting the real needs of the elderly. Currently, the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elderly education and care are facing such challenges as subject fragmentation, content segregation, and a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staff. It is imperative to develop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rough the fusion of legal and self-governing mechanisms at the top level,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mechanism,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and life aspects in the conte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iversific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in the methods.

Construc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Liu Shuaiqi, Wu Yinghui 145-153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refers to a relatively stable form of Chinese education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Its construction involves the summarization, positioning, and systematiz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types of Chinese educational form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for Graduate Education* (2022)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s independently categorized as a professional degree under the field of education, proposing new research topics for this discipline.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not only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iscipline's theoretical system, bu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op-level design of global Chinese educ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al forms worldwide,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struct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educational settings, educational objectives, educational nature, acquisition sequence, language status,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and teaching methods. It vertically refines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layer by layer and horizontally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allel and cross-fusion. Due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possesses openness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3+N"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which consists of 3 main levels, 14 main types, and several basic types, providing a framework. This paper also elaborates on the connotations, construction ideas,